

# 数字资本主义和大数据时代的卢卡奇\*

[英]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摘要]** 本文围绕《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观点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传播批判理论的借鉴意义展开论述,分析意识形态和物化意识,着重关注新闻与物化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通信技术的物化表现。文章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物化、意识形态和物化意识的批判在数字资本主义和大数据时代仍然是热门话题。卢卡奇的研究让我们能够批判性地分析社交媒体、大数据和其他各种互联网技术如何被当作物化工具来使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量化、资本和官僚主义的工具性逻辑统摄着人类活动并破坏团结,但与此同时,现代技术为合作和社会化创造了新的潜能。我们从卢卡奇身上可以学到的一个重要经验是,无论是技术,还是单独的个人,都无法实现数字媒体领域变革,从而使资本主义互联网被一种共享性互联网所超越这一目标,只有将那些具有批判意识的人组织成政治集体并让他们投入到改变技术和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关键词]** 历史与阶级意识 卢卡奇 数字资本主义 物化 物化意识 互联网

DOI:10.15894/j.cnki.cn11-3040/a.2022.05.01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哪些元素可以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传播批判理论的基础造成影响?为了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本文分析了意识形态和物化意识,着重关注新闻与物化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通信技术的物化表现。基于对卢卡奇理论的解读,本文希望表明,卢卡奇的理论可用于批判性地分析当代各种形式的数字传播。吕迪格尔·丹内曼认为,在“我们崭新的数字世界”中“需要更新卢卡奇的物化现象学”,以思考当代物化现象具有的“独特的理性和非理性的特征”及其“技术维度和人类特性”。<sup>①</sup>本文自认为是在完成这一任务方面所作的努力。

## 一、意识形态与物化意识

### (一) 物化

物化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关键范畴。卢卡奇用它描述和分析资本主义对人的主观性特别

\* 本文原载英刊《信息、传播与社会》(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1 年第 15 期(总第 24 卷),经授权发表,内容有删节。译者刘琪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明明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sup>①</sup> Rüdiger Danneman, “Georg Lukács’ Theory of Reification and the Idea of Socialism,” *Contours Journal*, Vol. 8, 2017.

是意识的结构性影响。物化概念源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

“商品结构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sup>①</sup>。卢卡奇在这里提及的是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马克思将商品描述为具有“幽灵般的对象性”<sup>②</sup>。通过将商品比喻为幽灵,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是,商品的价值表现为货币形式和商品价格,但它的实质——工人在阶级关系中为生产商品而必须花费的平均劳动时间——仍然是隐藏着的。

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和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在哲学与社会批判理论最近的讨论中占据着显著地位。例如,哈特穆特·罗萨将加速解释为一种异化过程。拉埃尔·耶基认为,物化意味着人的主体无法占有世界和自身。批判理论家阿克塞尔·霍耐特近年来的研究工作与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就是要发挥出这一概念的现实意义。他认为,物化意味着社会对人类的不尊重,缺乏对人类的认可。基于卢卡奇和霍耐特的研究,笔者将剥削、政治压迫和意识形态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的压迫。这一观点与大卫·哈维最近的著作是一致的,哈维指出,异化是一个普遍的过程,不仅发生在阶级关系中,而且发生在社会的许多领域。综上所述,这些学者的研究表明,物化意味着人类面临如下境况,在其中,他们无法控制其所面临的境况,人类和社会的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出来,某些群体为了实现自己的狭隘利益而将其他群体工具化。这种对物化的理解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物化的概述是一致的,他的理论仍然是21世纪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参考素材。

## (二) 作为物化的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

阶级意识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sup>③</sup>。被赋予的阶级意识是客观阶级意识。客观阶级意识由主体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来定义,它不仅仅是经验的意识,更是意识的“客观可能性”——“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

予以完全把握,就能认识与客观状况相符的思想和感情等等”<sup>④</sup>。虚假意识是一种“客观上无视社会发展的本质,表现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没有相应地表现这一发展”<sup>⑤</sup>的意识。

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双重性质:

(1) 资本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拜物教特征,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没有体验全部社会关系和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因此商品和货币的物性状态掩盖了基础性的阶级关系,使资本主义看起来像是无可替代的天然的和绝对的制度。

(2) 自然化是一般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策略,因为它使统治显得必要、永恒、必然和绝对,从而使压迫合法化和正当化。对卢卡奇来说,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特征。“掩盖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对于资产阶级本身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欺骗别的阶级,让它们没有清楚的阶级意识,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存在来说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sup>⑥</sup>

正如存在由管理者、顾问、资产阶级科学家、知识分子和记者等人员从事的生产意识形态的劳动一样,也存在着劳动意识形态:根据卢卡奇的说法,加尔文教派的意识形态构成了“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的自在之物结构神话化,并使之更加精炼”<sup>⑦</sup>。

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语言的物化发挥其作用的。卢卡奇援引了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话,并在脚注中写道“接着这种考察,就是马克思对物化结构深入到语言里去这种现象作出的非常出色的评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进行语言学研究可能得到很有趣的成果。”<sup>⑧</sup>

物化的社会也带来了物化的语言。物化语言在《牛津词典》中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现象。例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30—1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1页。

③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96页。

④ 同上书,第96页。

⑤ 同上书,第95页。

⑥ 同上书,第113页。

⑦ 同上书,第254页。

⑧ 同上书,第140页。

如,它将“交流”定义为“通过说话、书写或使用其他媒介传递或交换信息”。交换是一种社会关系,以特定数量的商品交换特定数量的另一种商品:  $x$  商品 A =  $y$  商品 B。在交流中,你不会期望用 10 个单词去“交换”10 个单词的。事实上,一个人可能会说出一个由 10 个单词组成的句子,而另一个人可能只用一个单词或一个由 20 个单词组成的句子来回答。语言通常不是商品,尽管它的对象化可以被转化为商品,正如书籍以特定金额出售这一事例所展示的那样。这个例子表明,资本主义的商品形式不仅物化了社会关系,而且作为物化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也物化了作为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之媒介的交流与语言。

“交换”的英语 exchange 源于拉丁语单词 excambiāre, 盎格鲁诺曼语单词 eschanger, 以及古法语动词 eschangier。在 16 世纪重商主义兴起时,“交换”被确立为“商人或贷款人见面交换债务票据”和“创建商业贸易”时的常用词。拜物教使特殊表现为一般。交流是所有社会的普遍特征,而交换只存在于由阶级、市场和劳动分工塑造的社会中。作为商品贸易的交换与作为交流的交流在语言上的融合,给人一种市场是所有社会的普遍而必要特征的印象。由于资本主义拜物教对语言的影响,《牛津词典》同时将“交换”定义为“简短的对话或争论”和“特定商品的交易”,后者指“可以进行涉及货币、股票等的商业交易以及将一国货币兑换成另一国等值货币的系统或市场”。

1923 年,卢卡奇写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最长的一章《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鉴于纳粹尚未上台,距离俄国革命仅过去五年,卢卡奇此时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潜能相当乐观。他认为,资产阶级具有必然的虚假意识,而无产阶级并非自动具有革命意识,但有看穿拜物教的可能。卢卡奇的政治乐观主义表现在诸如“无产阶级的意识暂时还屈从于物化”<sup>①</sup>或资本主义将“资产阶级禁锢在这种直接性中,却迫使无产阶级超越这种直接性”<sup>②</sup>之类的阐述中。

在俄国革命后的几年里,卢卡奇对无产阶级现状的乐观评估无疑比在 1933—1945 年或今天更合乎情理。但《历史与阶级意识》总体上没有过分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现状,而更多强调了无产阶级的物化意识。因此,卢卡奇谈到“存在无

产阶级意识形态危机,其中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落后于经济危机”<sup>③</sup>。“对于每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来说,物化是必然的直接的现实”<sup>④</sup>。“无产阶级从它登上历史舞台起就不断面临的危险就是,它和资产阶级一起陷入了存在的直接性之中”<sup>⑤</sup>。无产阶级可能无法“迈出这一步”,成为以“实践改变现实的同一历史主体—客体”。资本主义同时包括“物化形式的数量增加”和“物化形式越来越空虚(而破裂)”的可能性。<sup>⑥</sup>革命意识不是自动的,“就无产阶级的意识来说,发展是不会自行发挥作用的,即变革和解放只能出自自己的行动”<sup>⑦</sup>。“只有当工人意识到他自己是商品时,他才能意识到他的社会存在”<sup>⑧</sup>。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sup>⑨</sup>有三个根源:工人阶级中特权阶层的出现,资本主义的物化结构对意识的影响,以及改良派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驯化影响。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使无产阶级完全陷入物化的矛盾之中”<sup>⑩</sup>。对卢卡奇来说,共产党在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共产党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上”<sup>⑪</sup>。

### (三) 右翼威权主义和网络新民粹主义: 互联网上的物化意识

自 2008 年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主要的反应不是政治左派的加强,而是新民粹主义和右翼威权主义的兴起。在世界许多地方,极右翼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在蓝领工人中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支持。斯蒂芬·摩根等人分析了由美国社区调查确定的 1142 个地理单元中的投票行为与职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此分析中,工人阶级被定义为由低层次服务员、熟练的体力劳动者、非熟练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 125 页。

② 同上书,第 222—223 页。

③ 同上书,第 354 页。

④ 同上书,第 260 页。

⑤ 同上书,第 258 页。

⑥ 同上书,第 272 页。

⑦ 同上书,第 272 页。

⑧ 同上书,第 227 页。

⑨ 同上书,第 359 页。

⑩ 同上书,第 259 页。

⑪ 同上书,第 374 页。

的体力劳动者、农场主、农业工人和最高学历为高中文凭的无职业人员组成的群体。分析发现,“相对于2012年米特·罗姆尼作为近乎失败的共和党候选人的一般表现,2016年特朗普的优势在合格选民中白人工人占比最高的地区最为突出”<sup>①</sup>。

在许多国家都可以找到极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家和政党在选举中取得成功的类似案例。在许多情况下,蓝领工人强烈支持此类政治,这表明自2008年以来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将蓝领工人的意识物化的趋势有所加剧和扩展:相当一部分工人屈服于这种意识形态,即认为不平等和社会问题的根源是移民、难民和其他国家,而不是阶级关系和资本主义。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将国家间的结构性冲突和文化间的结构性冲突视为层级化的分歧,用以分散人们对资本和劳动力之间阶级冲突的注意力。在过去几十年中,阶级冲突导致利润和资本份额(利润和资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上升,而这是以工资份额(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下降为代价的。

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是当代右翼政治的主要传播工具。在过去几年中,分析右翼对互联网的利用变得日益重要,这正是卢卡奇所谓的物化意识在全球扩散的结果。民粹主义者通过在线媒体从四个方面传播着右翼威权主义:自上而下的领导、民粹主义、朋友/敌人阴谋以及对虚构的敌人采取军事措施的必要性。

为了让人印象深刻,这些意识形态需要以持续不断的小报新闻、丑闻、爆料等形式重复出现。社交媒体是传播假新闻和极右翼言论的合适媒介,因为它简短而肤浅,运行速度快,通过网络信息空间中传播帖子可以在短时间内触及大量潜在用户,支持通过“点赞”和其他表情符号的形式放大情绪,并吸引着个人对耸人听闻的消息的兴趣。资本主义社交媒体一直容忍着右翼的宣传,因为大量的内容和数据流量有望从定向广告中获得更高的利润。社交媒体不是当今世界中无产阶级物化意识的起因,但它是右翼煽动者用来传播意识形态的通信工具之一。极右翼崛起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政治产生了事与愿违的不良后果并形成一种消极的辩证法,其中,市场自由加剧了恐惧和不平等,而这些恐惧和不平等表现在对极右翼的意识形态、政治家、运动和政党的支持中。当

然,民主党和左翼激进分子也使用社交媒体,试图挑战极右翼的意识形态,并传播不同的故事和世界观。但毫无疑问,右翼威权主义意识形态助长了无产阶级意识的持续物化,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结构中社会问题的根源。

## 二、新闻与物化

### (一) 卢卡奇谈新闻

意识形态不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而是必须在社会关系中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自身。卢卡奇将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界定为意识形态的生产者。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是指在各种意识形态策略的帮助下创造出使资本主义和统治物化的故事的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新闻工作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劳动,是创造意识形态新闻故事的劳动。

卢卡奇认为,体力劳动者对物化的体验是相对直接的。他们的劳动“直接具有一种赤裸裸的抽象的商品形式,而在其他劳动形式中,这种结构是隐藏在‘脑力劳动’、‘责任’等等假面具的后面的”<sup>②</sup>。“物化越是深入到把自己的成果作为商品出卖的人的‘灵魂’之中,这种假象就越有欺骗性(如新闻业)。”<sup>③</sup>新闻工作者对自身工作的热爱和他们作为民主国家第四等级的道德意识——保障言论和意见自由,努力使权力透明并防止权力滥用——很容易掩盖他们作为工薪阶层的地位。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在一段话中说道“新闻工作者们‘没有气节’,出卖他们的信念和经验,这些只有当作资本主义物化的极端表现才能被理解。”<sup>④</sup>因此,资产阶级新闻业生产的新闻常常物化着资本主义与统治。在刚刚引用的这段话的脚注中,卢卡奇提到了贝拉·福加拉西所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未提及其标题)。福加拉西(1891—1959)和卢卡奇一样是匈牙利共产党党员。

这篇文章区分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报

<sup>①</sup> Stephen L. Morgan and Jiwon Lee, “Trump Voters and the White Working Class,” *Sociological Science*, Vol. 5, No. 10, 2018.

<sup>②</sup>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30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231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148页。

刊,并认为资本主义报刊是资产阶级为了支配“阶级整体的意识形态”而在阶级斗争中使用的意识形态武器。资本主义报刊所寻求的是塑造读者的意识结构,使其永远无法分辨真假,无法联系因果,无法将个别事实置于整体语境中,无法将新知识合理地融入其观点之中。福加拉西含蓄地指出,卢卡奇对物化意识的批判也适用于资本主义报刊。在资本主义报刊中,关注的焦点往往不是关于总体性、特殊性和个体性的辩证法,而仅仅是个别的、孤立的新闻片段。福加拉西认为,资本主义报刊的策略包括报道大量可以满足读者的求知欲的孤立事件,还包括去政治化和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这些都是为了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和伪造客观事实。相比之下,共产主义报刊则努力想要提升人们对社会整体的意识以及对单个事件彼此之间及其与更宏大背景之间的关系的意识,进一步揭露资本主义的报刊,以及推动读者作为报道的生产者参与其中。

福加拉西不仅将卢卡奇的物化和总体性概念应用于新闻业,而且在1921年就预见到了瓦尔特·本雅明提出的“将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和“将读者或观众转变为合作者”<sup>①</sup>的想法,以及贝托尔德·布莱希特提出的广播“让听众既能听又能说”<sup>②</sup>的观点。

## (二) 资本主义的新精神

在当代资本主义中,有创造力的工人对其劳动内容的热爱和高度的自主权已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掩盖了那些能够做自己喜爱之事的人往往处在不稳定条件中的事实。

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向知识工作者承诺其劳动的异化程度更低,他们可以通过这种劳动过上艺术家、名人或新闻工作者的生活。一系列研究表明,媒体行业的知识工作者认为,他们的劳动具有高度的创造性、自主性和自我实现感,但同时也往往高度不稳定。罗莎琳德·吉尔通过指出文化和媒体劳动的10个特征总结了此类研究的结论。这种劳动通常具有以下特征:(1)对工作的热爱;(2)以创新和开拓为目标的创业抱负;(3)通常是短期的、不稳定的和无保障的;(4)工资低;(5)工作时间长;(6)要求工人不断挖掘自身的知识和技能;(7)基于自学;(8)非正规;(9)在对待性别、年龄、阶级、种族、民族和身体残疾方面存在不平等;

(10)剥夺了工人规划未来所需的时间和资源。<sup>③</sup>

文化和媒体劳动看似比体力劳动更少被物化和异化,但往往构成了不稳定的自由职业,这种职业无法提供充分的社会、就业和收入保障。所从事的劳动是创造性的和创新性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可以使文化工作者的意识物化,使他们不把自己视为工人而是企业家,使他们对工会持敌对态度,把不稳定视为个人的过错,而不是资本主义强加的阶级关系,等等。资本主义的新精神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通过创造去异化的表象而使劳动物化,同时推行高度个性化的工作条件,削弱社会和收入保障。这是一种表现为非异化的新异化形式。工人们对这一新意识形态的反应是物化意识还是非物化意识,决定因素之一是,他们能否被集体地、政治化地组织起来并激发批判性意识,让他们看穿虚假表象背后的资本主义现实。

## (三) 网络虚假新闻的时代

依靠广告赞助的媒体聚焦于轰动性和娱乐性,以便吸引观众和向观众进行推销,它们往往以亲资本主义的和保守的世界观为特色。谷歌、脸书和推特采用定向广告的形式,这使得其能够借助于数字监控和大数据分析实现广告的个性化和个人化。剑桥分析公司的丑闻展现了基于定向广告的数字资本主义模式是如何与民主相冲突的:2013年,剑桥大学神经系统科学家亚历山大·科根开始使用脸书的开发者平台进行性格测验。结果,大约9000万用户的个人数据被收集并出售给剑桥分析公司,该公司的副总裁正是史蒂文·班农。剑桥分析公司在大选活动中利用这些数据向目标用户推送假新闻,这被普遍视为操控民主的企图。由于剑桥分析公司的不当做法,关于网络假新闻和网络后真相的批判性研究激增。结果是,脸书在2018年开始受到公共监督,因为它对其定向机制被用于反民主活动是知晓的。网络定向广告让大型公司可以利用其广告预算向目标客

<sup>①</sup> Walter Benjamin, *The Author as Producer*, Belknap Press, 1934, p. 777.

<sup>②</sup> Bertolt Brecht, “The Radio as a Communications Apparatus,” in Marc Silberman ed., *Bertolt Brecht on Film & Radio*, Bloomsbury, 1932, pp. 41–46.

<sup>③</sup> Rosalind Gill, “Life is a Pitch”: *Managing the Self in New Media Work*, Sage, 2011.

户进行企业和政治宣传,从而对公共领域进行操纵和“殖民”。在网络世界中,原生广告和内容植入广告使得人们很难从编辑内容中辨别出广告,这破坏了新闻的自主性。

有利于精英和资产阶级的选择性内容构成了一个新闻过滤器。除大众媒体外的网络传播是以分散式的通讯基础设施为基础的,原则上每个人都可以制作和传播信息。在网络世界中,权力等级制度和阶级结构从产出内容领域转向产出知名度和关注度的领域,企业、名人、传统和新晋精英主导着网络知名度和网络关注度。鉴于企业的社交媒体是以广告为基础的,关注度可以作为商品购买,这将有利于富有的公司和个人。

假新闻的历史与小报一样古老,但在网络世界,假新闻可以迅速传播,可以有针对性地向个人投放,并且通常很难区分制造假新闻的网络行为是人为的还是由算法操作的。右翼运动试图利用社交媒体传播他们的主张,并在网络上挑战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与世界观。他们不仅在线上使用机器人和传统的游说手段,还经常在网上诉诸威胁、恐吓和仇恨言论。

资产阶级媒体经常传播意识形态,但不只是传播意识形态。互联网上的意识形态传播倾向于视觉化和小报化。它使用的策略包括简单化(词汇少的语言)、情绪化、丑闻化、两极化、庸俗化、操纵、虚构等。用户创造着意识形态,这意味着生产意识形态的劳动并不局限于由专业的理论家来完成,而是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是耸人听闻的、民粹主义的、简单化的、情绪化的,并直接针对特定的群体。而算法放大了那些获得高度关注的人的观点。因此,我们发现了算法放大网络意识形态的网络趋势。

企业、名人和政治精英的行为导致了公共领域的殖民化。这些过程也发生在网络世界和社交媒体中,这些地方使用定向广告、算法、大数据、政治机器人、虚假网络新闻、数字监视和其他机制,最终导致互联网的企业和政治分化。

### 三、通信技术的物化

#### (一) 卢卡奇论知识工作者

卢卡奇在1919年撰写的《“知识工作者”和知

识领导权问题》一文中指出,知识工作者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那些“像体力劳动者一样,只能依靠劳动力参与生产的人(白领、工程师等)”,“明显地不同于那些脑力工作仅仅是其资产阶级身份(主要股东、工厂主)的附属品的人。这两个群体之间的阶级区别对客观的观察者来说是非常明显的,以至于不可能把他们都视为‘知识工作者’阶级而归为同一类人。”<sup>①</sup>

因此,那些参与生产的“知识工作者”(至多具有不明确的阶级意识)与体力劳动者属于同一阶级。知识工作者并不是“一个结构单一的阶级,因为即使在他们的队伍中,也可以清楚地划分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sup>②</sup>。

#### (二) 信息社会中的知识工作者

关于“信息社会”的讨论经常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作出区分。作为这种划分的一部分,信息和知识工作者通常被认为在服务业内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论点的问题在于,那些控制工人并代表资本家利益的管理者被说成在生产过程中与直接创造被出售以获取利益的的商品的生产性知识工作者享有相同的地位。

今天,知识工作者的阶级特征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许多有创意的工作者具有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他们通过一次性合同出售自己的劳动,并且没有雇用他人所需的资本。自由职业在知识工作者中尤其普遍,例如数据输入员、软件和网络开发人员、设计师、翻译员、作家、私人助理、编辑和校对人员。这些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为他人生产利润。只要自由职业者不成立除他自己之外还雇用其他人的企业,那么毫无疑问,他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新闻工作者要么是雇佣工人,要么越来越多地成为自由职业者。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一方面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正如卢卡奇所写到的,那些通过在其著作中为资本主义利益集团辩护而服务于他们的“物质、意识形态和权力利益”<sup>③</sup>的新闻工作者、顾问和其他人,就像管理者一样,也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只

<sup>①</sup> Georg Lukács, *Tactics and Ethics: 1919 – 1929 (Radical Thinkers)*, Verso, 2014, p. 12.

<sup>②</sup> Ibid., p. 13.

<sup>③</sup> Ibid.

有那些持批判态度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批判地考察资本主义——才真正意义上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三)对大数据资本主义时代技术拜物教的卢卡奇式批判

不仅存在借助技术传播的意识形态,还存在技术本身的意识形态。就数字技术来说,我们不仅在网络上发现了意识形态,而且还发现了网络意识形态本身。卢卡奇没有使用“技术拜物教”一词,但是描述了技术如何变成拜物教的对象。他谈到“被宿命论地接受的、不可改变的‘规律’用于人的一定的目的(例如技术)”<sup>①</sup>。技术拜物教“把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看作机器的‘永恒的’根本核心,从而歪曲了机器的真正的客观属性”<sup>②</sup>。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诸如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手机、大数据技术、物联网、云计算、工业4.0/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在资产阶级思想中往往被视为技术上的崇拜对象。一般而言,商业报刊是观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新趋势的一个好渠道。2017年5月,《经济学人》以《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资源不再是石油,而是数据》为标题刊登了一篇封面报道“一种新商品催生了一个利润丰厚、快速增长的行业。……一个世纪前,所讨论的资源是石油。现在,处理数据的巨头企业引起了类似的关切,即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石油。”《财富》杂志发表了一篇对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布莱恩·科再奇关于大数据的采访。他说“石油在20世纪改变了世界。它推动着汽车的发展,推动着整个化学工业的发展。……数据,我将其视为新石油。它将全面改变大多数行业。”基于人工智能的数据“不仅会改变商业,还会以某种积极的方式改变地球上每个人的生活”。

这些例子展现了技术拜物教的一些典型特征。(1)自主性:技术被呈现为独立于社会的权力结构。技术没有被置于社会总体中。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如何积极地改变社会,而没有关注它们如何被嵌入阶级结构、剥削和统治中。(2)主观性:技术而非人类被呈现为行动的主体“石油改变了……”数据“将改变大多数行业”,人工智能“改变地球上每个人的生活”)。该策略的目

的是,通过将技术发展呈现为独立于人类的意志和行动,从而将其物化为必然发生的、不可改变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逆转的。(3)革命性:技术发展被描述为革命性的,它迅速发生着,并改变着一切“数据”是“新石油”,“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石油”,“在这个技术世界中这种变化速度永远都不够快”)。这种描述策略的目的是,人类不会对取消某些技术或技术的某些方面产生质疑。(4)技术是唯一的原因,即数字决定论:技术被认为是社会变革的原因“它会以某种积极的方式改变地球上每个人的生活”)权力结构和社会矛盾被忽视。(5)技术乐观主义/悲观主义:技术背景下的社会变化被认为要么是完全积极的(技术乐观主义),要么是完全消极的(技术悲观主义)。例如,在上述例子中,大数据被认为“使消费者受益。很少人愿意离开它而生活”。或者,算法被认为可以预测一个人何时“有患病风险”以及它“以某种积极的方式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但是,没有人谈论实际或潜在的危害,例如算法监控、算法识别、错误和虚假预测造成的不良影响等。

(四)卢卡奇对量化的批判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量化逻辑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量化逻辑是物化思想和资产阶级意识的核心。“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现象被归结为纯粹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现的本质”<sup>③</sup>。资本主义使用科学来评估和优化投资、劳动时间、资本积累、商品、权力等。资本主义是基于资本逻辑进行积累的社会,资本逻辑被转移到社会的不同领域,如政治和文化领域,其目的不仅是要积累资金,还要控制决策权和解释权。为了进行积累,你需要评估现有数量,以此为基础来确定如何增加数量的策略。在过程结束时,对结果进行量化,以便确定当积累过程重新开始时需要采取哪些策略。资本主义必须发展出更新的合理化形式和新的生产方式,用以提高生产力、降低成本和积累资本。因此,资本主义技术史是一部合理化和量化方法不断发展的历史。

现代哲学是伴随着合理化技术共同发展的。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82页。

② 同上书,第209页。

③ 同上书,第49页。

卢卡奇认为,物化将总体性还原为局部性,这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而且还影响着官僚机构、国家、法律和文化。

计算的逻辑是还原论的和反辩证法的“自然科学的方法、一切反思科学和一切修正主义的方法论思想,都拒不承认它的对象中有任何矛盾和对抗。”<sup>①</sup>数理逻辑无法“一下子就通观整个体系”<sup>②</sup>。它将原因简化为基本原则(还原论),并相信世界具有严格的可预测性和可计算性(决定论)<sup>③</sup>。卢卡奇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明资本主义的量化拜物教“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现在已经不用再谈质量了。只有数量决定一切:时对时,天对天。”<sup>④</sup>卢卡奇写道“这样,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观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sup>⑤</sup>在1921年出版的文章《教育工作的问題》中,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对量化和自然科学的力量的信仰体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和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所提出的机械决定论中。<sup>⑥</sup>相比之下,批判性思维必须“完全摆脱一切形式的宿命论”<sup>⑦</sup>。它强调人的品质,例如人类改变世界的的能力。

(五)重新审视卢卡奇对量化的批判:对大数据分析的批判

在几乎所有学术领域中,量化方法的最新发展趋势就是大数据分析。这是一种收集大量数据并将算法和数学分析(例如相关性分析)应用于这些数据的方法,目的是识别模式、关系、相关性并预测行为,从而“监视、管理和控制公民”<sup>⑧</sup>。作为对大数据崛起的反应,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大数据分析及其社会影响的批判性研究。

大数据实证主义的定量方法忽视了社会分析的定性方面,如伦理、道德、批判、理论、情绪、情感、动机、世界观、理解、政治评估、权力、社会斗争或矛盾。危险在于,大数据分析促进了非批判性的、工具性的知识的发展,而这种知识在资本主义规则和统治的实施过程中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利益。大数据分析带来的另一个危险是,试图通过工具化的大数据理性根除批判性思维和批判性理论的计算机科学与商业研究联合起来,占领了社

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领域。卢卡奇分析和批判了物化工具的历史,而大数据分析是这一工具最新的发展形式之一。

大数据分析往往遗忘了阶级和统治。它的量化拜物教将社会视为由大量数据构成的事物,而无视构成社会的各种社会特性。大数据分析正是卢卡奇所描述的那种“拜物教科学”,它无视“矛盾和对抗”<sup>⑨</sup>以及整体性。

#### 四、结 论

我们可以将本文的主要结论总结如下。

(1)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基于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来构想社会,避免了唯意志论的自发主义和机械论的宿命主义的陷阱。在后来的著作中,他阐明了语言和交流在主客体辩证法中的中介作用:交流是主客体辩证法中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关系的中介过程。工作与交流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工作中的交流,交流中的工作)。

(2)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表明,物化意识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结构中存在着客观基础,并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元素,它通过使统治结构和实践自然化而为资本主义辩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交媒体已成为一种交流的媒介,物化思想在这里得到传播和受到挑战。尤其是,右翼威权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所包含的强力领导、民粹主义、朋友/敌人阴谋和军国主义等元素的传播,在推特、脸书和优兔等企业社交媒体上普遍盛行。

(3)文化和媒体劳动构成了一种新的物化形式:通过培养创造力和自主劳动,营造一种非异化劳动的氛围,进而转移人们对如下事实的关注,即此类劳动通常是极其没有保障和不稳定的。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4页。

② 同上书,第167页。

③ 同上书,第16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97页。

⑤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37页。

⑥ Georg Lukács, *Tactics and Ethics: 1919 - 1929* (*Radical Thinkers*), pp. 91 - 92.

⑦ Ibid., p. 93.

⑧ Vincent Mosco, *Becoming Digital: Toward a Post - internet Society*, Bingley, 2017, p. 8.

⑨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4页。



(4) 私有制/利润导向、广告和意识形态在社交媒体与互联网领域以新的方式展开运作,导致企业、名人和政治精英的利益对网络公共领域的殖民化。

(5) 卢卡奇对物化的批判包含对技术拜物教和量化逻辑的批判。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分析在多个方面都有着重大意义,包括对数字决定论和数字实证主义的批判。

(6) 数字决定论崇拜数字技术,将它们描述为自主性主体,带来了革命性的社会技术变革,这种变革要么完全是积极的,要么完全是消极的。

(7) 卢卡奇分析和批判了物化工具的历史,而大数据分析是物化工具最新的发展形式之一。大数据分析是数字实证主义和拜物教科学的一种形式,它忽视质量、矛盾和总体性。被用作物化工具的大数据分析促进了非批判性的、工具性的知识的发展,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

《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物化、意识形态和物化意识的批判在数字资本主义和大数据时代仍然是热门话题。卢卡奇的研究让我们能够批判性地分析社交媒体、大数据和其他各种互联网技术如何被当作物化工具来使用。新技术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和统治结构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数字技术领域没有其他替代性潜能和力量在发挥作用。卢卡奇反对决定论的分析,这意味着尽管剥削和统治在资本主义中无处不在,但是形成批判意识和批判行动(实践)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在物化的计算和技术中,量化、资本和官僚主义的工具性逻辑统摄着人类活动并破坏团结。与此同时,现代技术为合作和社会化创造了新的潜能。计算在不同的层次上发挥作用。一种关于社会和技术的社会主义框架并不需要废除计算,但需要改变其设计,从而使技术以人类为中心,处于集体行动中的人类掌控着技术的设计和使用,同时量化被纳入以人为中心的逻辑中。例如,社会主义的设计并不意味着废除社交媒体,而是让其真正社会化,从而使侵犯隐私、算法不透明、定向广告、个人主义和博取名声不再是其设计原则,取而代之的是,保护隐私、直接的人际交往、共同生产、合作、团结、知识共享以及算法透明开放成为设计原则。

如今,社会运动也使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来

挑战剥削和统治。诸如维基百科和替代性在线媒体等数字共享项目,正挑战着资本主义对数字技术的影响。此外,公共服务网络平台和平台合作社也具备对数字企业巨头的逻辑提出挑战的潜力。<sup>①</sup>它们都在试图创造一个非物化的、共享的、大众化的数字媒体领域。我们从卢卡奇身上可以学到的一个重要经验是,无论是技术,还是单独的个人,都无法实现变革数字媒体领域、从而使资本主义互联网被一种共享性互联网所超越这一目标,只有将那些具有批判意识的人组织成政治集体并让他们投入到改变技术和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人类的实践才能创造一个共享的互联网和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卢卡奇强调,工人委员会的建立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资本主义物化的克服”<sup>②</sup>。在数字时代,用户即生产者,存在各种各样的数字劳动者,创建由工人和用户所有的平台合作社以及公有的公共服务互联网平台是工人阶级对抗数字资本权力的一部分。此外,今天我们发现社交媒体和应用程序已被用作社会斗争中的交流武器。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零工经济中的工人在互联网的帮助下提出了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当前,数字媒体不仅是物化的工具,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借助数字媒体,当代数字无产阶级有机会“通过扬弃自身,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实现无阶级社会,才能完善自身”<sup>③</sup>。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周艳辉)

① Christian Fuchs, *The Online Advertising Tax as the Foundation of a Public Service Internet*,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8.

②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28页。

③ 同上书,第129页。